



南雍学术经典

主编 张一兵 周 宪

东方诗哲 方东美论著辑要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雍学术经典

主编 张一兵 周 宪

东方诗哲 方东美论著辑要

王月清 李钟梅 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诗哲方东美论著辑要 / 方东美著;王月清,李钟梅编.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1
(南雍学术经典)

ISBN 978-7-305-05642-0

I. 东… II. ①方… ②王… ③李… III. 方东美
(1899~1977)—哲学思想—文集 IV. B2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2233 号

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南雍学术经典
书 名 东方诗哲方东美论著辑要
著 者 方东美
编 者 王月清 李钟梅
责任编辑 顾 涛 金鑫荣 编辑热线 025-83593947

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
印 刷 南京溧水秦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24.25 字数 336 千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5642-0
定 价 48.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tt.js.cn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洪银兴

学术的传承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积累过程。在对中国现代学术的“世纪回眸”中，我们在重估和评价百年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就中国现代人文科学而言，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留下前辈学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他们的独辟蹊径汇成了我们的康庄大道。

众所周知，南京大学是当代中国为数不多的百年高校之一。她有两个历史源头：一个是肇始于 1902 年（光绪二十八年）创立的三江师范学堂，1914 年以后，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等时期，1949 年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次年定名为南京大学；另一个是 1888 年（光绪十四年）成立的基督教会汇文书院，后来发展为金陵大学。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全国院系调整中与南京大学合并，构成了现在的南京大学。这样一个经历不仅显示出她的悠久，还显示出她的坎坷——不断地更名，不断地重组、合并、调整。其实这正是中华民族近现代颠沛历史的缩影。而南京大学历经沧桑，卓然屹立，形成了鲜明的学术传统，涌现出众多的名师大家，给我们留下丰硕的学术遗产，其中必有一种不可磨灭的精神力量，这大概就是南京大学的校训：“诚朴雄伟，励学敦行。”其中“诚”字最为根本，也是南京大学历史上最早的校训。“诚”是真实而不虚妄的真理，也是追求真理、诚信

不欺的美德。

南京大学深厚的人文社会科学传统是南京大学精神的典型体现。20世纪上半叶,伴随着民族文化的重建过程,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充满了中学、西学、新学、旧学、科学、玄学的争论,“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主义”是当时中国大学总体性的人文精神,而历史上的南京大学又提出过具有自我取向的“昌明国故,融化新知”、“人文与科学平衡”等学术主张和办学宗旨,可见南京大学采取的是一种“中庸”的态度,走的是温故知新、继承创新的学术路径,她的两个历史源头已经显示出这样的学术趋向:一是建立在中国教育传统上的“新学”,但提倡国学、艺术与科学三者兼通融合;一是具有西学东渐背景的教会大学,却对中国文化重视有加,成立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较早的中国文化研究所。这样的源头活水,不断地吸纳志同道合的名师大家,汇成源远流长、独立不迁的学术传统。

今天,中华民族进入伟大复兴的时代,南京大学迈向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的进程,我们饮水思源,愈加感到受益于这些名师大家们赋予我们的学术财富和精神力量,愈加渴望对他们孕育的传统加以系统的研究总结,返本开新,发扬光大。

“南雍学术经典”丛书是南京大学历史上学术大师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名著精选。它吸收中国传统学术史中“学案”的编纂形式,邀请大师们的学术传人或研究专家,精选荟粹大师们的学术代表作,对其生平、学术加以述评并制作学术年表,再按不同的学科陆续分辑出版。这样一项研究性的出版工程,不仅勾勒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脉络,而且在新的视角下展示了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精华,其中不乏首次被整理、公布的珍贵资料。同时,为了进一步展示20世纪南京大学的学术面貌和学术贡献,我们以后还将陆续推出其他学术大家的经典著述。我们相信,这套书系的出版不仅是南京大学学术传统研究的丰硕成果,而且也为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提供了一份极富价值的学术文献。

2008年3月28日

目 录

东方诗哲方东美传述	王月清 李钟梅 1
生命情调与美感	40
生命悲剧之二重奏	59
哲学三慧	118
中国人生哲学概要(节选)	135
中国人的人生观(节选)	157
中国哲学对未来世界的影响	195
中国哲学精神	219
与熊子贞先生论佛学书	253
中国大乘佛学引论	269
《华严经》所诠之义理——五周因果周	295
谈宋儒所传承的学术传统与时代背境	316
赞叹我民族之美质,感喟于人心之萎靡	331
罗家伦先生纪念谈话	342
坚白精舍诗集选	352
方东美先生生平简表	369

东方诗哲方东美传述

王月清 李钟梅

在中国的 20 世纪,有这样的一位哲人:他有着最深厚的儒学渊源,也接受了最严格的西学训练;他不乏缥缈恣肆的道家资质,也具备悲智双运的佛家本怀;他有着金刚怒目的勇气,也有着儿女情长的细腻;他力图超脱党派,却终身为政治纠结——这就是方东美,一个以现代人的身份,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智者;一个原古今文化源流,察东西文明得失,设计生命理想蓝图的仁者。他会通中西哲学,建构了宏大的比较哲学体系;他悲智双运,援诗入哲;他践行当下,期许未来,被誉为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史上的“东方诗哲”。

方家有儿初长成

1899 年,戊戌变法的第二年,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风云际会之时,一个大转折、大激荡的时代拉开了帷幕。正月初九,安徽桐城上上下下都还沉浸在新年的喜悦中。这天,桐城枞阳县义津镇双兴村大李庄的方家院落,更是洋溢着忙乱和喜庆的氛围:桐城名门方氏家族又添了一名呱呱坠地的男丁。这个孩子就是后来被誉为东方诗哲的方东美先生。

桐城“雄奇俊秀,甲于江左”,号称“天下文章出于斯”。而桐城方氏更是望重江南的书香世家。方姓有三大家族:桂林方、鲁谷共方、会官方,其中“桂林方氏迁桐最先、起家显达者最早且久”。方东美即为桂林方后裔。桂林方氏“素业儒”,在明代即以方学渐、方大镇、方孔照、方文、方以智的道德文章而远近驰名;其桐城一世始祖德益公,元末时由河南迁来,定居枞阳;五世祖方法(1368—1403),为方孝儒门生,明成祖靖难之变后,孝儒被夷十族,方法自沉殉节死;方东美七世嫡祖方佑(廷辅),首中进士、一门

登科，吏科给事中王瑞题“桂林”于其门，取“折桂登科如林”之意。十一世祖方学渐（1540—1615），号本庵，为王阳明四传弟子，方氏家学建立，从方学渐开始；十二世祖方大镇（1562—1631），官至大理寺少卿，刚正立朝，直声满天下，人称“方大理”；十三世祖方孔炤，巡抚湖广，明亡后，归隐白鹿山庄，撰《周易时论合编》。方以智，为方东美十四世祖，文采冠世、人品卓绝，有“四真子”誉：“真孝子、真忠臣、真才子、真佛祖”，出家后，常住江西青原，承禅门青原行思的法脉。方苞，方东美十六世祖，为清朝“桐城派”开创者之一，主张文章写作要重“义理”、“考据”、“文章”。正是对士人人格和气节的坚持，使得桐城方氏一门书香赓续不绝。

方东美先生早孤，两岁时父母双亡；长兄道怀务农；次兄义怀，毕生从事教育，曾任桐中校长，桐城教育局长。方东美3岁开始读《诗经》，在“儒家的家庭气氛中长大”。纵览群书，并蓄百家本是方氏一族的传统。“幼年每值除夕，辄宵坐聆听瑰兄议论古今，达旦不寐”。而童年的方东美由着赤子之心，“酷嗜庄子书”，深受老庄恢宏诡谲之浪漫情调的影响。儒家品格与道家气魄的兼容互补，熏染着幼时的方东美，为他的以后的学养打下了坚实基础。

方东美是在家乡读的小学。当时是旧学堂与新学校并存的时代，而方东美所读的学校就是一所“新制学校”。14岁时，方东美考入桐城中学。桐城中学的创始人吴汝纶，作为维新运动的创始人，他推崇“中学为体，西学为器”的办学思想。所以当时的桐城中学以传授新知识、启迪新思想为主要教学内容，受到众多少年人的追捧。后来在美学、文学批评方面卓然成家的朱光潜先生就是方东美的在桐城中学的同学。

1917年，英语底子较好的方东美考入金陵大学。金陵大学是美国基督教会美以美会（卫斯理会，Methodist Church）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大学，前身是1888年在南京成立的汇文书院（Nanking University）。1907年，美国基督教会于1891年创立的基督书院（Christian College）和美国长老会于1894年创立的益智书院（Presbyterian Academy）合并为宏育书院（Union Christian College）；1910年，宏育书院并入汇文书院，成立私立金陵大学。

(Private University of Nanking)。金大一度有着“江东之雄”的美誉。

金陵大学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一向对中国很友好。当时，该校有两位教授主管金陵大学的入校国文考试：一位是国文系的刘伯明先生，另一位是历史系姓徐的教授。后东南大学成立，刘伯明教授被请去做副校长，徐教授被请去做教育学院院长。这两位教授都是金陵大学的老毕业生，爱校情深，深恐他们这一离开，中国文化在这家洋学堂被弄得不伦不类，于是乎这两位教授就跑去见校长包文，向校长建议：“金大欲聘国文教授，须经两人同意，一为黄仲苏，一为方东美。”^①由此可见，方东美深厚的国学功底在金陵大学是得到公认的。事实上，中国经史典籍的课程虽在金大也列为必修课程，但因为当时校方难以聘到有名的学者，教学质量并不高。有一次，国文教授在堂上讲《诗经》，方东美听着、听着，觉得先生讲的有些地方不妥，便向老师提出疑问，老师听他问得有道理，就请他上台代讲。这位清初古文大师方苞的十六世嫡孙高兴极了，于是将自己5岁就开始熟读的《诗经》讲了一课，从注释、分析到评点讲得头头是道，有条不紊，全班同学听得津津有味。

金陵大学一向重视英语教学，各系科除国文、中国经史等课程采用中文课本外，其余课程一律采用英文原版教材，并用英语讲授。而受过系统新式教育的方东美英语造诣也很高，当时哲学系“宗教哲学”这门课的主讲是曾留学英伦的博士，但这位老师所上的课刻板没有新意，不能折服这群年少气盛但又聪明好学的青年。在这位教授的课堂上，不时有窃窃私语和小小骚动出现，这让老师十分生气。他质问学生，“你们觉得哪里讲得不好，就上讲台来说。”结果，学生们又一致推举的英文阅读听写能力都不错的方东美。在略显尴尬和紧张的气氛中，没有任何准备的方东美走上三尺讲台，说道：“老师讲的是西洋学问、宗教哲学，学问内容是大家过去毫无基础的；但是所用的课本是英文。根据英文的正确了解，老师方才

① 见方东美《段锡朋先生纪念谈话》，《方东美先生演讲集》，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2005年版。

对内容的解释，实在有值得商榷的余地。”^①于是，方东美娓娓解来，赢得全班同学由衷的赞叹。

哲学系是金陵大学文学院成立最早的系科之一，最初由韩穆敦博士(Dr. C. Hamilton)主持，韩穆敦对中国文化很尊重，认为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有着与西方哲学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因此金陵大学哲学系注重兼收并蓄，既讲授“中国古代哲学史”，也讲授“西方哲学史”，而且关注近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新趋势，开设“中国现代哲学史”、“现代西洋哲学”、“宗教哲学概论”、“社会哲学概论”、“伦理学问题”、“专家研究”、“专门研究”等课程，同时为了让哲学系学生进一步了解方法论，特意开设了“思想方法论”和“论理学问题”等课程。^②这种开放的学风不仅让方东美系统地了解了西方哲学，也给他提供了走近佛学的机会。再加上金陵刻经处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方东美曾亲近过最负盛誉的唯识学者欧阳渐(欧阳竟无)，对欧阳大师及杨仁山居士几位门人的解行、修证，都表示赞佩，对竟无先生考证《大乘起信论》的真伪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大乘起信论》即或为后人伪造，而内容完全符合佛旨，历代相传，学者仍然应该奉为圭臬；因佛法有所谓“依义不依语”的原则，无论《大乘起信论》是否为马鸣菩萨所著，学者读了之后只有好处而无坏处。

在金陵大学期间，研读佛经也让方东美和韩穆敦博士结缘。韩穆敦教授有着深厚的中文根底，在认识方东美后也逐渐接触了《唯识三十颂》等唯识经典。作为基督教信徒的韩穆敦教授一直思量着为什么在中国基督教接受程度不高，而佛教在中国盛行的问题。在接触佛家经典后，他产生了把《唯识三十颂》翻译成英文的想法。最终，韩穆敦博士下了二十多年苦功，精研唯识，才把《唯识三十颂》翻成英文，风行欧美，成为西方人研究唯识的权威学者和先驱。^③而方东美也终身保持着和韩穆敦教授的良好

① 见孙智燊《学生时代的方东美先生》，杨士毅编《方东美先生纪念集》，台湾正中书局1982年版。

② 见张宪文主编《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5页。

③ 见孙智燊《学生时代的方东美先生》。

好师生关系。

在金陵大学,方东美还因缘际会,结识诸多知交。据方东美回忆:一日,从教堂出来,黄仲苏以其背影酷似旧友郑伯奇,于是追踪急呼,两人偶遇交谈,意兴盎然。黄仲苏雅好桐城文体,而方东美则颇憾桐城文长于叙事短于谈玄,彼此家学渊源,相见恨晚。两人引为莫逆,并因此结交了如左舜生等少年中国会的同人。

但金陵大学是所教会大学,校方要求学生必须选修宗教课,并规定每周有宗教集会三次,星期日有大礼拜,全校教职工和学生人人必须参加,以培养灵修生活。在校园里,宗教气氛十分浓厚,宗教仪式也非常严格,每逢星期天,师生都要去礼堂祈祷。此时,训导处会派人在礼堂里巡视,查看是否“虔诚”。稍有不慎,轻则警告,重则开除。在教堂做礼拜,这对天性活泼的方东美来说是个约束。他对金大的办学制度颇为不满,更不愿意做礼拜,又不敢违规不去。每次做礼拜,他总是想方设法另辟蹊径“开小灶”,为自己寻找一个隐蔽的位置,便趁此机会偷看小说。后来,方东美回忆“《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是做礼拜的时候偷偷读完的”。有一次,他正津津有味地看小说,训导员走过来发现了,“祈祷时偷看小说,这还了得”。于是训导处把这件事提到全校教授团会议,主张“开除”。

方东美先生的恩师,美籍教授韩穆敦博士站出来为方东美讲话了。韩穆敦博士在教授团会议上倾力为自己的学生辩护,他直言大学应该有大学的教育宗旨,教会大学也不例外。大学教育的宗旨是培养未来社会各界优秀的领袖人才,不能因为一位优秀青年在教堂里不守规矩的一件小过失,就把他拒之于大学校门之外。

金陵大学虽然在当年是由一些教会和教会人士创办的,但创办金大的这些教会人士多属开明派,对学生虽然也进行宗教宣传,但并未采取强制性措施,反而更多地关注新教育制度的建立。时任金陵大学校长的包文博士(Dr. Baldwin)“深信教育之首要作用在养成高尚的品格;而宗教为培植仁勇公民之要素”,并明确宣布:“本校虽为教会设立,但不强迫任

何学生皈依教门,但愿尽吾人义务,使学生明了各种教谛,庶将来作自由的选择。”^①方东美这次险被开除引起了包文校长的注意,他特地抽时间召见方东美,想看看这位学生为何方神圣。面对着大学校长,方东美抑制住紧张心情,把自己平时和同学们的所议所想和盘托出。方东美认为:金陵大学虽然是教会学校,但大学要有大学的教育精神,不可以将教会传教士训练班的那一套搬到大学里来。同时方东美还敏锐地觉察出当时金陵大学面临的隐忧,他认为自从孙中山先生革命成功之后,中国已从次殖民地的地位中站起来了,西洋教会想要在中国立足发展,一定得多了解、多尊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应该加强并注重中国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等文史方面的课程,否则在中国很难找到更大的发展空间。当时,金陵大学在美国纽约教育局立案,金陵大学的毕业文凭由纽约大学校董会签发,毕业生持此文凭便可不经考试直接升入国外有关大学研究院深造。对此,方东美认为这虽然为毕业生留学海外提供了便利,但学校从未向中国政府当局立案,今后中国教育制度逐步上了轨道,金大如果不向政府申请立案,那所发的文凭就不会被中国政府承认,也会影响毕业生的前途。^②这些建议正好契合了包文校长改革学校某些制度的想法,因此他听了之后对方东美顿生好感,觉得这个少年人勇气可嘉,建议可取。在包文校长的推动下,金陵大学的文史课程师资阵容逐步加强,学校也向中国政府教育部正式申请立案了。

少年心事当拿云

方东美先生自幼好学深思,风神端凝,上大学后更以富正义感闻名,同学戏呼之为“方怒美”。^③在金陵大学期间,方东美一身兼数职,既是学生团体“中国哲学会”主席、学生自治会会长,又是学报《金陵光》总编辑。

① 包文《金陵大学之情况》,《教育季刊》第1卷4期。转引自张宪文主编《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孙智燊《学生时代的方东美先生》。

③ 孙智燊《学生时代的方东美先生》。

作为金陵大学第一个问世的学术刊物,《金陵光》秉承推广规模、保存国粹、灌输学术的思想,以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泰西学术,实高于吾人之上,何妨借人之长,以济己之短”^①。《金陵光》刊登学术论文、时评文章和文学作品,是民国时期国内学术界的重要刊物。这一办刊宗旨也深刻影响着方东美以后的研究道路。

1919年7月1日,由王光祈、曾慕韩、周太玄、陈愚生、张梦九、雷眉生、李大钊等人商议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受启于“少年意大利”、“少年土耳其”运动,立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标举“奋斗、实践、坚忍、俭朴”的作风,力图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问、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俗。

“少中”存在期间,先后有120余人入会,诸如宗白华、高君宇、邓中夏、张闻天、刘仁静、恽代英、毛泽东等,都曾“少中”会员。在方东美的回忆中,少年中国学会皆“个性独特,而思想自由,情感富瞻。居平生活抑又律己甚严”^②。同年11月,“少中”南京分会宣告成立。在“少中”南京分会第一批少数会员之中,就有方东美,“少中”成立当年创办《少年中国》月刊,方东美一度任编辑。1920年1月,“少中”另创《少年世界》月刊,由南京分会编辑,方东美任该刊总编辑。同年毛泽东也正式申请加入“少中”;他亲书的入会申请表还一直保存在方东美家里^③。

“少中”成立前后,正值“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五四翌日,北方学生代表段锡朋、陈宝镗、周炳琳、刘仁静等纷纷抵达南京、上海、广州。而川鄂青年如王光祁、陈愚生、恽代英、余家菊,留日学生田汉、郑伯奇等亦纷纷相继会集宁沪。当这批青年学生代表南下至宁沪发动响应北京“五四”运动时,方东美很自然地成为当时南京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与北京南下的学生代表段锡朋、周炳琳、陈宝镗接洽,参与发动了南京的“五四”运动。

① 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编《金陵大学史料集》,第283页。

② 方东美《苦忆左舜生先生》,《方东美先生演讲集》,第376页。

③ 孙智燊《学生时代的方东美先生》。

当时,北方教育界情形很不稳定,而且有很多官僚在那里,在政治上表现许多出恶例,所以北方的青年容易激动。而南方的政界、新闻界和教育界关系良好,要发动学生运动响应北平,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如果南京不发动,上海、广州和武汉就更难激发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方东美等“少中”会员合计,运动从南京高等师范发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要把有着外国背景的金陵大学当作运动的大本营。

金陵大学的校方觉察到了这个情况,在几个有着留洋背景,但思想狭隘的教授推动下,学校公布了一个布告,宣布因时局不稳,学校从即日起开始放假。这样一来,方东美等人在学校没地方吃住,只有四散回家。针对这个局面,方东美作为学校学生自治委员会委员和校刊主编,带着一大批人来到一位只懂洋文的印教授家里,要求他到校长处取消布告,否则就揍人。方东美的“怒美”可把这位教授给吓着了,他到校长处说:“这条子原是我向校长建议的,现在他们不准我这样做,我只好禀明校长,取消这一条。”^①由此,南京“五四”运动的大本营就稳定下来了。方东美找到数学系的一位同学负责纠察大队,农学院的一位同学负责宣传大队,把学生组织起来,控制了南京鼓楼到下关的交通,第二天一起发动,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也纷纷加入,于是“五四”的风潮在南京激烈地鼓荡起来。

1921年,方东美22岁。7月1日至4日,他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的第一届年会。会上,在讨论“学会宗旨及主义问题”时,方东美坦率地指出:“我的意思,亦只赞成能有一个明确的宗旨便好了。我们对于学会,最初只是非理智的爱悦,那是学会诗的时代。其次各就已见,对学会宗旨加以悬想的解说,那便是学会旧哲学时代。从今以后,要入学会的科学时代。学会宗旨与事业,均须有个明确合理的解释,我信原定学会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规定得很好。这已指出学术不能分开,而且果有益于社会,为学亦活动之一种。少年中国是纯洁而多方的。学会但能为她有一点一滴的贡献,便无愧创造少年中

① 方东美《段锡朋先生纪念谈话》,《方东美先生演讲集》,第401页。

国的话。”

和同时代的青年学子一样,“德先生”和“赛先生”激荡着方东美的心灵,并由此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有所发觉并认真思索。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系统教育的方东美渴望一窥西方哲学的门径,因此,他的兴趣在西方哲学。金陵大学哲学系正好给方东美提供了一片直入西哲殿堂的场地,在这里,方东美接触到罗素、柏格森、尼采等人的文章和著作。

20 世纪上半叶,西学东渐,新旧思想激荡,中国本土文化和西方异质文化不断地碰撞、交流,其中以法国哲学家柏格森为代表的西方生命哲学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关注。生命哲学反对科学实证论和理性主义,推崇非理性主义,强调以生命为中心来看待整个世界,把形而上学作为哲学研究的首要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中国传统哲学精神。而这时方东美恰好又看到一篇罗素对柏格森极尽挖苦能事的文章,更引起了方东美研究柏格森哲学的兴趣,下决心要通读柏格森的著作。谁知竟因此而终生爱上了柏格森,成为柏氏在东方的最大知音之一。

虽然后来方东美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精心研究过,但大学期间的方东美更侧重于策勉国人“站在社会里来改革恶社会,实际创造新生活来代替旧生活”的“奋斗的精神”和“创造的能力”。他和那个时代所有有热血、有担当的年轻人一样,深切关注着有着深重内忧外患的祖国,渴望以科学精神拯救国家和民族。年少的方东美“认定哲学也同科学一样,要明白事物真相,再用聪明的行为来促他向善”。方东美这个时期发表在《少年中国》上的《柏格森生之哲学》、《唯实主义的生之哲学》、《詹姆士底宗教哲学》,基本上可以反映他当时的学术兴趣的主要方面。1920 年 6 月,他出版了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译著:莫越(D. L. Murray)的《实验主义》。后来,方东美觉得“实用主义”似乎太过肤浅,逐渐抛弃了这种学说。

金陵大学的求学经历不仅夯实了方东美的哲学基础,也开拓了他的学术眼界。1921 年,方东美拿到了金陵大学校方的推荐信,前往美国的著名学府威斯康辛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WI)研究院继续深造。8 月,辞别了亲友的方东美和吴国桢、梁实秋以及王崇植、浦薛

凤、顾翊群等一时青年才俊一起坐上轮船，自上海经檀香山，远渡重洋，到美国游学，追寻新的梦想。

游美三年苦治学

1921年8月，方东美由金陵大学推荐到威斯康辛大学求学，师从该校柏格森、怀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研究的权威学者，同时对黑格尔哲学与生物科学也有深刻研究的名教授麦奇威(Evander Bradley McGilvary)。刚开始，麦奇威教授对这位初来乍到的中国学生并不是太注意，他有些不以为然地对方东美说：“要了解西洋哲学，光通英文是不够的，非兼通德文不可。”但很快这位中国小伙子的勤奋和毅力让他的美国导师刮目相看。

当时德文教师的辅导课是以小时要价的，每小时五个美元。囊中羞涩的方东美请了一位德文教师用两小时教会发音和拼读后，然后凭借艰苦的自修，不久就能直接阅读康德、黑格尔、尼采、哥德等人的德文原著。此外，为了确实掌握西洋哲学中重要术语的意涵，他还认真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在熟练掌握各种语言工具后，方东美如饥似渴地阅读世界哲学名著，尤其是柏格森的哲学著作，并选择了《柏格森式生命哲学之评述》(A Critical Exposition of the Bergsonian Philosophy of Life)作为自己的硕士论文题目。这篇论文得到了麦奇威教授的赞赏，认为内容充实精彩，文笔优美，作为范文给系里其他教授和研究生传阅。

硕士阶段的学习使方东美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有了更深的体认，柏格森对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以生命为主体，将世界看成一个不断创新和生成变化，处处蕴涵着生命冲动的领域，而生命的本质就是纯粹的时间绵延，因此必须从时间的延展中来把握生命的变迁。在方东美以后的哲学思索里，他便开始以生命为中心审视中国传统哲学，并对其进行重新诠释，从而展开一种全新的理论范式。可以说，方东美一生出入中西哲学之间，对柏格森生命哲学的认同和扬弃也正是他创建会通融和中西哲学体系的基点。

少年方东美在中国求学时就已经显露出对潮流不盲从、不趋奉的姿态。在美国求学期间,这种对学术潮流不盲目追随,也不一味排斥的特立独行态度更是凸显。方东美留美的时候,正值美国哲学界一窝蜂反黑格尔,提倡“新实在论”(Neo-Realism,又名新唯实论),为此,方东美排除种种阻力来到俄亥俄州立大学,追随美国研究黑格尔哲学硕果仅存的雷敦教授(J. A. Leighton),认真研读、专门研究黑格尔。一年以后,方东美觉得对黑格尔思想有了足够程度的了解,就遵守诺言回到了威大,选择“新实在论”作为博士学位的研究方向。1924年夏,方东美以论文《英国与美国唯实主义的比较研究》通过博士论文的答辩考试。

留美三年,方东美直接接受了西方哲学的严格训练。他在扬弃的过程中接受了柏格森以生命为中心的生命哲学;同时怀特海的机体主义哲学也对方东美产生重大影响。柏拉图、海德格尔、尼采等众多哲学家的思想也从不同侧面,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方东美哲学体系的创立,为他以后更深体认和融会中西哲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为一个中国“穷留学生”,在美国求学的三年也让方东美最真实最直接地体会到西方社会的人生况味。他看到一些中国人在美国还没待上两三年,开口就以“We Americans”自居的内心虚弱;也感受印度人到美国很多年,传统服装从未变过的坚持和骄傲。赴美一年后,方东美在给“少年中国学会”的同道左舜生、陈启天等人的信中写道:“我在美国所得关于美国的印象,远不如在国内时所想的那样好。一个悲观的人无论在中国或在美国,都有促成自杀的同等机会。”^①

但不管境况如何,方东美的卓异和热情始终难掩其迹,在留美期间留下了颇多佳话。1921年之后,来自英伦的西方大哲罗素在中国讲学完毕,转道访美,正好来到威大所在城市。“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方东美和几位访美的中国青年怀着对故土深深的眷念去拜访罗素,谈到中国面临的种种困境和问题,方东美等人对问题认识的深度和各自的才气深

① 见《少年中国》,第4季第1期载“会员通讯”(1923.3)。